

哈佛燕京“卖书”记

我在哈佛教中文的那几年，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年年都有一次卖旧书的盛会。

说卖旧书是盛会不免有些夸张。不过对我来说，买旧书要比买新书激动得多。买旧书的时候，你不能像在书店里面那样悠闲地翻阅，那样从容地挑选；买旧书的时候，你得抢在第一时间内去寻觅你要的宝贝，你要在五花八门的故纸堆里淘出对你闪亮的金子。淘金觅宝总是让人兴奋，不只我一个人兴奋，你看那些闻讯赶来的个个都很兴奋。

卖书的地方在燕京学社一层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，离卖书的时间还早，买书的人已经从会议室排到了大楼门口。大家引颈翘望，盼着快点儿开门。这急急的样子有点儿像闹饥荒时抢购食物；又像是商店大降价时疯狂购物。

终于等到了开门，人们一下子拥进堆满了书籍、杂志的会议室。这时候大家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刚才还聊着天的人这会儿不说话了；见到熟人也不招呼了。书丛中只见人头攒动，房间里只听见“哗哗”的翻书声和时不时的书本掉落在地上的“噗噗”声。

燕京年年都卖书，年年来买书的人都有了经验。知道这里的宝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为了多一些机会，多一份收获，每个人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似地在书架上迅速地扫来扫去；许多只手把一本本的书从书堆中抽出又很快地放回。此时此刻，书名只要大概齐，不管内容如何，无论版本好坏，先拿在手里，抱在怀里，甚至堆在角落里再说。

也就是个把小时，几乎所有的书都被翻检过一遍，自己需要的书也都搜罗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才一个个回过身去，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堆书从头到尾，一本本地再次斟酌、筛选、去芜存精。

有时候你突然发现，一本你最想要的书在别人的手里，你就会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走来走去，只盼望他能把手搁回书架。然而，当他最终还是把书放进他的那一堆儿的时候，你也就只好眼巴巴地望洋兴叹了。不过，你还有希望，希望他在最后付款时候把它拿出来。

很多人都这样，自己挑好了，并不忙着离去，守在别人的旁边，拣拣别人淘汰下来的等外品。要不，就是站在门口的付款处，等着接收那些付钱时才发现银

子金贵的人恋恋不舍留下来的宝贝。

这买旧书的情景，听我如此这般地描绘了，就好像是一个你争我夺的战场，或者是一个无情又无奈的情场，其实也不尽然。

有那么一回，一位研究生模样的人女生，对我手里一本《XX 的源流》的书不停地赞叹。有过很多次同样经历的我自然明白她的心思，我自称是诸子百家无所不收的书橱，能到我手里的书就一定会随我回家的。可是经不住她那赞叹后面的渴望；想起曾几何时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情，想到在国外这地方能找到对自己专业有用的书实在太难了。我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让她把对书的赞叹变成对我的感谢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东亚图书馆，馆内的中文图书有 70 多万册，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居全美第二。图书馆的入口处很自豪地悬挂着古文字学家罗振玉 1931 年手书的“拥书权拜小诸侯”的横幅，意思是说“拥有万卷藏书相当于独尊一方的诸侯”。

我们知道，任何一家图书馆，不管它的藏书量多么丰富，也还是要不断地购书以扩收藏。为了腾地方安置新书，就要把一些旧书和重复的书腾出来。哈佛燕京收藏的都是好书，放出来的自然也就都是宝贝了。所以卖书的告示一出，大家就奔走相告，趋之若鹜。

大家对燕京卖书情有独钟，不仅是因为那些书都是宝贝，还因为那些宝贝的价钱便宜得使人难以置信。

在美国，大概只有中国城的中国书店有中文书可卖。书也是以稀为贵，中国书店的书价高得吓人。很多出售大陆书的书店似乎都遵循着这样一个规矩：不论近几年大陆的书价如何的飙涨，他们都按照后面的原始标价出售，只是买书的人需要用美金付这个数字。这也奇了怪了，在洋人的世界里，几乎所有“Made in China”的东西都很便宜，唯独中文书除外。对于中国书店的中文书，除非特别急需者，我一般不敢问津。许多书我都从国内带来。1997 年暑期率全家回国，妻子、儿子与我，用国际航班允许的最大额度，带回来了七箱子书。第 7 箱书是化整为零，手提肩背上飞机的。

那么，燕京卖的书到底有多便宜呢？随便从书架上抽几本来看看：精装十六开 1166 页的《辞海〈语词分册〉》中华书局词书编辑所 1961 年版，只要两美金；

1410 页臧励龢编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》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，两美金；777 页（清）袁枚《新齐谐、续新齐谐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，两美金；还有清人钱大昕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、吕思勉的《先秦史》、赵诚的《甲骨文与商代文化》、周一良的《中国历史通览》、冯钟平的《中国园林建筑》等等，都是两美金一本。

这些书实在是太便宜了！便宜到这个份儿上，你就不好说是花了银子买的。可是要说拣的又失恭敬，所以我都说是哈佛燕京惠赠的。古人受王赏赐时要“对扬王休”，我这里感激哈佛燕京嘉惠学子的恩泽了。特别那些已经绝版的书，例如：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的《国音常用字汇》、赵元任和杨联陞的《国语辞典》、台湾大陆杂志社编的《语言文字学》以及 1954 年第一版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以往我每得一本书，便喜欢在扉页上涂鸦。除了记录买书的时间地点以外，还有购书时的经过和感慨。有时扉页的空间不够，便续在尾页上。要是一次买多了，没有时间搔情了，便只签一个名字落一个时间。

可是在燕京买书，回回都很多，多则上百本，少则几十本。所以不要说在扉页做记了，就连签名都不能够了。可又怕遗失，怕同事借去忘还。于是就用深红色的大笔，在排成一排的书脊上从左到右大大地一划，然后告诉大家，凡是书背上划有红道的都是我黄某的书。这种毫无科学、并有贪占嫌疑的黄氏标记法，也实在有点太霸道了。

离开哈佛后便没有了买旧书的机会。不过听哈佛的同事说，我走后燕京也不大卖书了，说是把它们捐给了什么地方。这些年来，每当我从这些书中得到我需要的资料时，就会有一种对哈佛燕京的感激之情。我写过的几本小书：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的《汉字部首例解》、《汉字知识与汉字问题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汉语文字答问》，以及在香港、美国出版的几本汉语文化教材，还有杂志上的专栏、报纸上的散文，这许多，哈佛燕京的书都功不可没。

[2011 年 11 月 24 日光明日报副刊](#)